

周恩来同志的光辉革命 实践活动资料选编

青海省图书馆编

一九七七年一月

周恩来同志的光辉革命 实践活动资料选编

青海省图书馆编

一九七七年一月

中共中央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自一九七二年患癌症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他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九一九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一九二六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

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党中央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组织的工作。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一九四五年八月，他跟随毛主席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他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回到延安。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同志从建国以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同志从党的五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中央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党的六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九届和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多么尖锐，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坚决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目 录

淮安、绍兴人民无限怀念周总理·····	(1)
沈阳市第六中学师生怀念周总理·····	(2)
周总理青年时代在天津·····	(3)
在大革命的峥嵘岁月里·····	(4)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卓越领导者——周恩来同志·····	(15)
周恩来同志领导“八一”南昌起义·····	(18)
周恩来同志在长征中·····	(19)
延安人民怀念周总理·····	(25)
周副主席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重大贡献·····	(26)
湖北人民怀念人民的好总理·····	(31)
周副主席在红岩村·····	(33)
周副主席视察新四军军部·····	(36)
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	(38)
周副主席随同毛主席转战陕北·····	(42)
敬爱的周总理与鲁迅·····	(44)
敬爱的周总理与《新华日报》·····	(47)
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	(54)
敬爱的周总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好参谋长·····	(60)
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 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而奋斗·····	(65)
光辉的业绩 杰出的贡献·····	(74)
巍巍周总理 粪土“四人帮”·····	(78)
伟人长眠五洲哀 丰功伟绩全球赞·····	(82)
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87)
铭记周总理的教诲 靠毛泽东思想导航·····	(97)
编后记·····	(103)

淮安、绍兴人民无限怀念周总理

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淮安，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淮安度过的。早在解放初期，周总理就教育在淮安的亲属，不要说出他住过的房屋，并要求邻居也这样做。以后，周总理又多次嘱咐他的亲属：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旧居。但是，人民群众怀着对周总理的爱戴，不断有人前来淮安要求瞻仰周总理故居。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对他的亲属说：“把房子拆掉，就没人去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〇年，周总理两次接见到北京去的县委负责同志，都一再交待说：“要把我住过的房子拆掉，不能和毛主席的旧居比。”邓颖超同志也曾专门找县委负责同志，郑重而诚恳地进行劝说。为了这件事，我们县委专门作了研究，并向省里作了报告，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爱戴，一直没有拆迁周总理故居。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四次打电话来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请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旧居。”这句话深情地表达了周总理对毛主席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不禁使我们联想起在井冈山上、在长征途中、在延安的窑洞里、在中南海的灯光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认真学习、忠实执行、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日日夜夜，联想起周总理满怀激情地指挥革命群众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动人情景。

《青海日报》一月五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时，我们——周总理故乡的人民无比悲痛。绍兴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忠实地捍卫和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曾深入各地，到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不断揭穿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团结群众，联合抗日。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周恩来同志来到绍兴，一面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面指导我党的地下革命斗争。他在绍兴的大善寺召开了各界爱国同胞大会，亲笔书写下了许多题词。接着又到诸暨枫桥紫阳宫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团结抗战的方针，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当时，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日寇侵占了杭嘉湖，进逼绍兴城。周恩来同志向绍兴人民详细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他说：只要团结民众力量，抗日之胜券必操我手。他在题词中鼓舞人民：“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前途光明。”他号召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要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与日本侵略者作拚死的斗争，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他号召妇女们学习秋瑾的革命精神，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战斗。他在给他表妹的题词中要他表妹“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他看到枫桥的妇女自己组织起来，就非常高兴地鼓励她们好好干，努力革命。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刻，周恩来同志到处宣传鼓动，使我们绍兴人民的抗日斗志受到了极大鼓舞。当时枫桥人民曾组织了一千多人来欢迎他。大家把周恩来同志的话比作“迷途的航船找到了灯塔”，个个斗志高昂，把抗日的火焰愈燃愈旺。

《文汇报》一月十二日

沈阳市第六中学的师生怀念周总理

我们沈阳市第六中学，是敬爱的周总理少年时代上学的地方。

敬爱的周总理在一九一一年前后在我校这个地方念书。当时的学校叫“东关模范学堂”，是由两所小学合并而成的。现在，校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就是我校的这所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总理少年时代在楼上最西头的一间教室上课。

据当时学校的教师和同学回忆，那时的周总理虽然只有十几岁，就有了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他喜爱畅谈国家大事，目光远大，胸怀改造旧中国的大志。据总理当年的同学回忆，当总理离校赴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师生们对他恋恋不舍，他曾给同学留言，表示了献身改造旧中国的志向。

当时，总理能写很好的文章，他的作文，师生常赞不绝口。教英语的教师也称赞总理学英文“学得好，学得快，学得认真”。

总理少年时代谦逊朴实，勤奋好学。当时接触过他的人说，总理说话不多，说出来就很中肯，使人信服；他尊重教师，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同学不会的课业，只要经他发现，就主动帮助，告诉明白；他生活俭朴，从不讲究穿戴，总是身穿一身普通的布衣，脚穿一双普通的布鞋。

总理的教师和同学还回忆，每当下课时，总理常到楼下操场上参加体育活动，他特别喜欢踢足球，注意锻炼身体。

《沈阳日报》一月六日

周总理青年时代在天津

我们怀着无限崇敬和无比悲痛的心情，含泪观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更加怀念我们日夜想念的周总理。

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一九一三年九月，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同志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当时，辛亥革命已经失败，政权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夺去了。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封建军阀各自依附帝国主义势力，割据地方，兵荒马乱，弄得国家危亡，黑暗社会风雨飘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茫茫黑夜里，救国救民的出路在哪里？

先进的人们，走上探索的路。我们在展出的《敬业》杂志创刊号上，看到周恩来同志在当年写的一篇纪事里，作过这样的记述：一九一四年二月，他和三个同学发起组织社团，“辨难析疑，轶出于课程之外，研究各种学识”，探求真理。三月四日、七日、十日，他们邀集了二十多个同学，多次在丁二教室开会，酝酿筹建，议定社团名叫“敬业乐群会”。周恩来同志思想先进，品学兼优，在同学中享有很高威信。大家都愿团结在他的周围。当时，有二百多学生纷纷要求入会，并公推周恩来同志参与起草会章程，选他为社团领导人之一。从此可以看出，年仅十六岁的周恩来同志已经开始带头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了。

三月十四日那天中午，学校礼堂特别热闹。会场正中挂着金光灿烂的大会标，上面写着：“敬业乐群会成立大会”，好几百人为它的光辉诞生热烈鼓掌。随后，他们演出了揭露社会腐败，宣传爱国精神的新（话）剧《五更钟》。黎明虽然远未到来，但它已经敲响了战斗的五更钟声！

请读周恩来同志参与主编的敬业乐群会会刊《创刊词》中的这段话：

“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周恩来同志胸怀这样远大抱负，投身于中学生活。当我们细读展出的许多当年《敬业》杂志、《校风》周刊时，想见周恩来同志非常勤奋，好学，积极，热情，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是个很活跃的有志青年。这些报刊都是他参加编辑的。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期间，他先后担任过《敬业》杂志、《校风》周刊总编辑。他自己也写了许多评论文章与新闻报道，发表在这些报刊上。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地理风俗，从世界、国家大事到球讯往来，他都有所评论记述，对丰富学生知识、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挥了启蒙作用。从那些字里行间，我们不但看到年轻的周恩来同志刻苦好学，知识广博，而且想见他后来一样，天天在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地学习，工作，战斗。记载说明：他的功课最好，考试成绩经常在九十分以上。在几次全校数学速算和作文比赛中，周恩来同志都名列前茅。课余，他从事着大量的社会活动：他担任全校学生会领导成员和敬业乐群会会长，领导学生

活动；他任智育部部长，组织同学研究学识；他任稽古部部长，带领同学与复古思潮作斗争；他任演说会副会长，组织并发表演讲；他当记事部部长，采写通讯报道；他参加新（话）剧团，参加话剧排练演出……每当夜晚，人们走过西斋三十五号学生宿舍门前，经常看到他的屋里还亮着灯光：周恩来同志在伏案学习着，探索着……

周恩来同志非常注重群众，注重实践。他把自己学到的新思想，醒觉到的救国救民新道理，经常通过各种形式和机会，宣传给群众，动员人们觉悟起来，复兴中华。

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的三年时间里，周恩来同志参加排练并演出了十个多幕新（话）剧，揭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召唤人们走向光明。这些新剧的演出，推动了中国话剧运动史的发展，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大影响。

周恩来同志还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一九一五年六月六日，他在天津救国储金募款大会上，针对当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阀买办阶级卖国勾当，提出“爱国志士决不愿借外债以度日”的号召。

展出的三篇文章，引起我们的注意。那是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一六年写的评论，无情抨击了孔丘。他以无可辩驳的论理，怒斥“儒之孔”的谬论，谓“误也”。历史是对“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攻击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儒”的有力批判。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同志结束了中学时代，在南开学校毕业了。

那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

当年十月，周恩来同志抱着这样的志向，飘洋过海，东渡日本……

到五四运动中去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象一声春雷，震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国大地，唤醒亿万被压迫被欺凌的奴隶，在全国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

在樱花盛开的时候，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同志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毅然从日本乘船回到了天津。海河两岸，迎接他的是如火如荼的斗争。

周恩来同志呼唤暴风雨，暴风雨已经来了！革命需要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回来了！

“周恩来回来了！”青年们争相传告，都高兴地跑去看他。从此，周恩来同志积极参加了领导了天津这场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在那风起云涌的日子里，天津的五四运动，与北京和全国各地相呼应，正在高潮。天津反动军阀政府为了扑灭人民革命烈火，出动大批军警，残酷镇压群众，下令复工开市，殴打、逮捕学生……。

领导学生运动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了宣传、组织、领导这场斗争，急需建立自己的舆论喉舌——报纸。学联认为，周恩来同志是最理想的报纸主编人。一天，学联负责人拜访周恩来同志，邀请他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机关报。周恩来同志马上欣然答应说：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既然需要我编辑出刊《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

七月二十一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崭新、战斗的姿态胜利出版了。开始它是对

开大张日报，后来改为对开一张半（六版）三日刊。每期最高日销两万多份。除在天津广泛发行外，还远销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它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隔了五十年的今天，我们在展览里看到当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仍被它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所感染。

为办好《会报》，周恩来同志日夜操劳。白天，他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晚上，他在灯下写稿编报。有时他还亲自跑到南市荣安大街承印《会报》的协成印刷局去校对稿件。每天孜孜不倦地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可曾料到，当周恩来同志忘我工作的时候，在他的办公处所周围，在承印《会报》的印刷局里，都有密探、巡捕暗中监视盯梢，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但是，周恩来同志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和群众在一起战斗着：

在反动军警弹压下，他英勇走上街头演说，宣传抵制日货……

在反动军警的刺刀下，他参加游行示威……

八月二十三日，为要求惩办杀害群众领袖的山东省戒严总司令马良，北京和天津的二十五名代表在北京新华门前，第二次向徐世昌政府请愿，全部被捕了。京师警察厅警察总监吴炳湘企图“杀一儆百”，扬言要枪毙这些代表。这个消息传到天津，学生联合会有的人沉不住气了。周恩来同志十分镇静地对大家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这坚定沉着的话语，感染着每个人，大家都随之振奋起来。接着，周恩来同志说：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于是，学生联合会一方面立即组织代表团赴京营救被捕代表；周恩来同志一方面组织出版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号外，在大街叫卖：“号外！号外！同胞们：京津请愿代表被捕了！我们要群起反对！要营救他们！”顿时，消息传遍全天津，引起人民的义愤，都大骂卖国政府。

那知，天津数百人组织的代表团到了北京，和北京的三千多青年学生，在新华门至天安门的长安街上被反动武装军警包围了三天三夜，最后天津代表团领导人也被捕了。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这困难危急时刻，周恩来同志亲自率领群众赴京，同反动政府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汹涌澎湃的群众压力之下，反动政府终于在八月三十日将被捕代表全部释放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斗争一天紧迫一天。反动当局对战斗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吓得要死，怕得要命，一直不准它“立案”，几次扬言要查封这张报纸。周恩来同志根本不理睬它那一套，坚持出报。后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就派密探恫吓印刷厂，不许承印。周恩来同志机智与之斗争，几次更易印刷地点。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反动当局公然强迫《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停刊了。但是，革命的舆论是封锁不住的。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过了十五天之后——十月七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又复刊了。它象一把利剑，刺向敌人；它象一个火把，点燃了爱国人民的斗争烈火。

《觉悟》和觉悟社

九月二日下午，一列火车从北京向天津飞驰……

进京请愿的被捕代表虽然被释放了，但斗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复杂了。今后怎么办？

在车厢里，由北京归来的周恩来同志和七个去请愿的青年都在思虑着以后的斗争。他们议论说，北洋军阀政府如此野蛮凶横，对它的斗争将是长期和复杂的，我们必须加强男女青年学生的团结，才能更有力量。一位女青年建议：把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合并，共同行动。周恩来同志很赞成这个意见，并进一步提议：把这两个青年学生组织中的领导骨干组织在一起，成立一个更严密更有力的核心团体，领导斗争。这个意见，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一致表示赞许。——这就是著名的“五四”时期天津觉悟社的发起。

九月十六日下午，在草厂庵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里，周恩来、邓颖超等二十个男女青年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大家讨论确定了团体的宗旨、任务、入社条件、组织形式，并决定用白话文出版一个宣传刊物。周恩来同志提议，刊物取名为《觉悟》，这个团体就叫“觉悟社”。

觉悟社的诞生，标志着天津青年运动进入新阶段。它在后来的斗争中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和先锋作用。

展厅里，在觉悟社社员合影照片下面，陈列着《觉悟》第一期，上面刊载着周恩来同志写的《觉悟的宣言》。它宣称：

“……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对觉悟社的人们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他们经常邀请一些进步教授来社作学术报告；他们经常组织讨论座谈，学习研究世界新思潮；他们经常开会，研究当时反帝反封建斗争形势、策略和任务，……这些在他们“‘觉悟’道上”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十月一日，周恩来同志领导觉悟社的人们，参加七省代表团，为解决山东问题，到北京总统府进行了第四次请愿斗争。那天，他们与北洋军阀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双方在新华门前对峙了一天。后来，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实行武力镇压，逮捕了三十三个请愿代表……

接着，周恩来同志与北京学生联合会约好，同时在京津两地发起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十月十日上午，天津各界群众在南开操场集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政府对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正当群众开始游行的时候，天津警察厅派来大批警察和保安队，把会场层层包围住。这时，邓颖超同志一声令下：“冲！”女学生们不顾反动军警用枪托殴打，奋力冲出一个缺口，浩浩荡荡直奔金汤桥，包围了警察厅。展出的一张照片，记录了这一实况。从这张照片，我们看到人民群众在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中正觉悟起来……

狱 中 斗 争

在展厅里陈列着周恩来同志编写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目录》两本书，掀开了周恩来同志狱中坚贞不屈的篇章。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两点钟，周恩来同志领导一千多示威群众重重包围了设在天津金钢桥畔的直隶省公署，强烈要求启封一月二十三日查封的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释放同日逮捕的二十四个代表。直隶省长曹锐慑于人民正义斗争的声威，把大门紧紧关闭，不敢出来接见群众。周恩来同志和另外三个代表奋不顾身地进去，与之说理斗争，结果也被捕了。

敌人是狡猾的。对周恩来同志等，先是用硬的办法——打；后来又用软的办法——拖：既不正式审讯，又不释放，妄图借此消磨革命者的锐气和斗志。但周恩来同志英勇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在展览厅墙壁上，镶嵌着周恩来同志当时在狱中用毛笔写的一份申辩书。它用大量铁的事实，以无可辩驳的逻辑，无情揭露了敌人，打击了敌人。

有一天晚上，敌人集合被捕代表“训话”。分散回去时，一张纸条在一个个“犯人”手中传递着，打开一看，上面用铅笔写着：“质问警厅，既不审问，又不释放，是何道理？”这个纸条是周恩来同志写的。第二天，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到各个监房巡查，大家都厉声质问他：“警厅捕人，依何警章规定？为何不公开审判？”杨以德无理可讲，吱吱唔唔地狼狽退走。当他走到周恩来同志的房间时，见周恩来同志正在埋头编写《察厅拘留记》。杨以德想凑到跟前问话。他那知，周恩来同志早就有所准备，便把事先写好的一张纸条递给他。这个警察头子本来目不识丁，但他却装模做样地打开纸条，看了一遍，然后说：“很好，我回去考虑。”他回去后，找秘书一念，内容和其他“犯人”质问的一样，气得他脖子上的筋一蹦老高，大声喊道：“一定要把领头的查出来！”

一天，杨以德突然把被捕代表分组召到花园会议厅，由司法科发给每人一份“答卷”，提出二十一个问题要每人回答。什么学生联合会是何人提倡、组织？什么《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何人主笔？等等。这是敌人设的圈套。周恩来同志便串通被捕代表回答：“不知道”。杨以德无可奈何，又让司法科找周恩来同志个别“谈话”，先是假惺惺地说些夸奖学生爱国的话，然后问道：《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谁主笔？周恩来同志答道：“没有主笔。”又问：“学生联合会的经费从何而来？”周恩来同志很严肃地回答说：“你们现在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经济内容，我也无需回答你！”

四月初，周恩来同志和被捕代表宣布绝食：要求更大限度自由，要求立即开庭“审讯”。绝食消息象长了翅膀，越过牢狱高墙，很快就在社会上传开了。反动当局惊恐万状，怕引起更大“骚动”。于是，便采取诱骗的办法，让他们进食，妄图平息这次斗争。那知所有花招都使尽了，并没有达到目的。正当这时，邓颖超同志等二十四人赶来，找到杨以德说：快把我们关起来吧，我们是来替换代表们绝食的。杨以德皱着眉头说：“哎，这怎么行呢！诸位先回去，我马上把代表们的要求转给省长，决不延误。”结果，反动当局被迫放松管制，允许被捕代表们在院里散步、串门。这时，周恩来同志便把大家组织起

来，教大家学习，给大家讲马克思传、唯物史观总论同阶级斗争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还组织了政治、学术、社会问题讨论会……这些情况，在周恩来同志编写的《检厅目录》里都有记载。

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经过被捕代表的坚决斗争，反动当局被迫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七日全部释放被捕代表出狱。周恩来同志踏破牢门，胜利走上新的征途。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和觉悟社部分社员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去了。

周恩来同志经常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展厅里，展出了当年他从一位天津同学手中借的一本书——《卡尔·马克思的生活与教育》（英文版）。周恩来同志回国后，把这本书还给了那位同学。我们看到周恩来同志用铅笔在书上马克思这段话的下面划了着重线：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周恩来同志在旅欧期间，还经常给天津觉悟社社员通信，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邓颖超同志和在津觉悟社社员商议，把社员彼此间的通信摘要汇编发表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上，取名为《觉邮》。今天，这些《觉邮》都展览在我们面前。在一篇题为《西欧的“赤”况》的周恩来同志来信中，他写道：

“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周恩来同志在另一封来信中说：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

周恩来同志一生实践了青年时代的誓言。

《天津日报》一月七日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本 报 记 者

在大革命的峥嵘岁月里

记周恩来同志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

中共广东省委理论小组历史组 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这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直战斗在广州，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他坚决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边，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开展工农运动，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勋。

今天，我们来到周总理当年在广州战斗过的地方，缅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的革命业绩，感到分外亲切，无比激动。他在大革命的峥嵘岁月里英勇斗争的情景如在眼前。他的光辉榜样，激励着我们永远前进。

为贯彻“三大”的正确路线而斗争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广州召开的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同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会上出现了陈独秀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和张国焘反对建立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倾向。毛主席亲自到广州参加了“三大”，同这两种错误倾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会上确定了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了工农革命运动的新高潮。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二四年按照党的指示，从巴黎回国，到达广东，担任中共两广区委的委员长。他一踏进广州就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为贯彻“三大”的正确路线而斗争。

革命群众运动的兴起，越来越猛烈地冲击着一切反动、腐朽、没落的势力，这就必然地越来越引起帝国主义者和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的恐慌和仇视。一九二四年十月，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商团在广州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妄图将当时广东的革命政府扼杀在摇篮之中。

在广东革命政府处于危急关头，中共两广区委发动广州各界革命群众在第一公园（现中央公园）召开反对反动商团的示威大会（十月十日）。周恩来同志亲自参加和指导了这次大会，并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份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满腔义愤，揭露了商团的卖国行径，鼓舞广大革命群众对商团进行坚决回击。针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软弱动摇，周恩来同志强有力地指出：“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很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作先驱，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广州工农群众在中共两广区委领导下进行了英勇斗争，增强了孙中山对解决商团事件的信心。十月十四至十五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工农武装和广大人民协助下平定了商团叛乱，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颠覆阴谋，取得了反帝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毛主席在“三大”曾特别强调指出，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合作时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牢牢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商团叛乱事件中，周恩来同志就是遵照毛主席的路线、思想，在反革命商团刀枪林立、街垒四布中，毅然带领群众对敌人勇敢战斗的。

随着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等大造反革命舆论，在北京召集“西山会议”，疯狂进行反共活动。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一九二五年秋重来广州，主编《政治周报》，亲自写下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迎头痛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在这一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周恩来同志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同国民党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周恩来同志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是早有觉察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广东政治现象中，很明显地看出：国民党右派是永不革命的，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他们“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在文章中提醒革命人民，要警惕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行为，提防他们篡夺革命领导权。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暗杀了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消息传来，周恩来同志十分义愤，在黄埔军校政治部里奋笔疾书，写下了悼念廖仲恺先生的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的卑鄙行径，指出杀害廖仲恺先生的，“决不是普通的政敌，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暗杀案的后边藏有很大的黑幕阴谋”。为了彻底追查杀人凶手和幕后策划者，周恩来同志受党的委托，参加了“廖案检察委员会”。那时凶手正关押在黄埔军校里，周恩来同志亲自提审犯人。

廖案发生后，阴险毒辣的蒋介石包庇和放纵杀人凶手，打击国民党左派，以达其逐步篡权的目的。周恩来同志洞悉蒋介石的阴谋，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恩来同志打断蒋介石“第一只手”的事迹，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蒋介石骗取孙中山的信任，窃踞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后，安插亲信，结党营私，妄图把军校变成他培植个人势力的场所，而王柏龄就是他的忠实走卒，被称为他的“第一只手”。一九二五年年初，蒋介石为了排斥打击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指使王柏龄等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同共产党人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他们造谣攻击“青年军人联合会”制造事端，甚至纵容孙文主义学会头目林振雄殴打“青军会”的负责人，引起了革命师生的极大愤

慨。周恩来同志将林振雄撤职查办。王柏龄对此事十分不满，他依仗蒋介石的淫威，肆无忌惮地向共产党人进攻。他派人监视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的行踪，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为了打击王柏龄的反动气焰，周恩来同志指示蒋先云等同志，公开揭露王柏龄打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使这个“教授部主任”威风扫地，蒋介石也感到众怒难犯，无可奈何。

革命不断深入，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进一步暴露，他对共产党人更为仇恨，“中山舰事件”就是他策划的打击共产党人的反革命事件。

我们知道，“中山舰事件”完全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向我党发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毛主席主张把一切反蒋力量集中起来，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以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但是，陈独秀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无耻地为蒋介石辩护，胡说：“谁要反对蒋介石就是反对革命”。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周恩来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同蒋介石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上午，周恩来同志立即赶到扣押着共产党员的广东造币厂，当面质问蒋介石，严词斥责他制造反革命事件，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的罪行。蒋介石在大义凛然的周恩来同志面前，膛目结舌，哑口无言，不得不将关押的人释放。

“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重视不重视武装斗争，要不要建立革命军队，这是当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问题。陈独秀反对共产党人掌握军队，胡说“共产党人搞军队就会变成军阀”。毛主席坚决反对陈独秀的错误主张，十分重视掌握革命武装和培养革命军事干部问题。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创办时，毛主席就极力主张我党选派党员到军校工作和学习，以培养党的武装骨干。

一九二四年秋，周恩来同志受党的委派，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在军校紧紧依靠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军校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在师生中还组织了革命青年的先进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团结教育广大师生，大力宣传马列主义。不少师生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

为了武装学生的思想，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周恩来同志在军校作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演讲，精辟地分析了军队的来源、军队的阶级性、革命军队与反动军阀的根本区别。周恩来同志在毛主席关于掌握革命武装的思想指导下，特别着重指出：“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军队要为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讲课时联系学生的实际，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连学校的教员、工人也跑来听讲，大礼堂总是挤满了人。

一九二五年二月，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黄埔学生军出师东征。在广大工农的支援下，三月底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这时，驻在广州地区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叛乱，形势异常紧张，周恩来同志闻讯，立即率领黄埔学生军回师广州，镇压了杨、刘叛乱。十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支持下死灰复燃，重新